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By Thomas G. Rawski et. 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97 pp.**

在經濟史研究的領域裡，經濟學者與歷史學家長期以來都維持著一個若即若離的關係；造成這種現象的關鍵在於經濟學者面對非計量性資料與主觀性陳述時的態度，以及史家們對於經濟理論和數據使用方法上的了解或容忍程度。不同的學術訓練當然是導致雙方從不同的角度撰寫經濟史的重要原因，但要研究歷史中的經濟活動，雙方必須建立對話性的關係，才能使經濟學者的解釋符合歷史經驗，並使歷史學家的分析更見精闢。本書的出版不僅僅是一本會議論文集，也是美國經濟史學家，尤其是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同好們，努力擴大經濟學與歷史研究對話性關係的展現。

本書編著之動機始於 1987 年 1 月在夏威夷所舉辦的 *Economic Methods for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會議；在本屆會議中，專攻經濟史的經濟學者們曾提議為參與的歷史學家編列一份包含了經濟選擇、長期趨勢、總體經濟、國際經濟議題、和經濟制度的參考資料。<sup>1</sup> 1988 年再次於亞利桑那州 Oracle 召開同名之會議，前述的提議得到歷史學家們具體的回應，會後並由 Thomas Rawski 和 Lillian Li 合力編纂這些歷史學家所發表的論文，在 1992 年由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出版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sup>2</sup> 相較於歷史學家的效率，1987 年經濟學者們所貢獻的論文，由於體例與表達方式等問題始終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加上撰寫者的更動，本書之發軛雖早於前書，其出版時間卻拖到了 1996 年。Rawski 教授曾表示，本書的出版應早於 1992 年之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而且本書的定位是

---

<sup>1</sup> Thomas Rawski et. al.,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xiii.

<sup>2</sup> Thomas Rawski and Lillian Li ed.,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一本向歷史學家推廣經濟理論的論文集，1992年出版者則屬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實證應用。<sup>3</sup>簡言之，兩書的出版分別代表了經濟史研究的理論面與實證面，而且編者預期的閱讀次序也應該是先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後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從編者的觀點而言，所謂經濟學與歷史學的對話關係，實際上不僅存在於本書裡，似乎也應該存在於這兩本書的出版關係中。

本書第一章“*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基本上是全書的簡介，由匹茲堡大學經濟系教授 Thomas Rawski 執筆，開宗明義地指出著書的目的在於「企圖彌補歷史研究者使用經濟學上的距離感」。<sup>4</sup>作者認為經濟活動從來就是歷史現象的一部份，因此經濟學者與歷史學家實在沒有理由忽視對方的存在，反而更應該攜手合作，共同提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Rawski 認為從經濟分析的角度入手，不僅能擴大某些歷史研究個案的深度，也能將相關的現象賦以更有意義的連繫，使得經濟活動的歷史研究更見廣度。易言之，作者強調運用經濟學將更能突顯歷史事件間的各種關係，因而開發新的歷史解釋空間，並擴大個別資料對歷史全貌的詮釋力。大體而言，本章交代作者群著書的動機，並為讀者準備了較為淺顯的基本知識，以利讀者進一步閱讀隨後更為複雜的討論。

為呼應前一章的說法，在第二章“*Issues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Trends*”中，Rawski 教授以其研究近代中國經濟成長的經驗指出，研究長期經濟趨勢是了解中國近代歷史變動重要的一環，因此史學家應當熟悉各種基本的經濟名辭及其定義，並且學習如何以定量資料分析從一般性資料所得到的印象或假設。作者指出研究「福利經濟、所得與財富分配、商業化程度、作物種類、和經濟活動形式」都是探索長期經濟趨勢的入手處；而在數量資料方面，糧價、農家產出及所得等都是可資利用的材料。<sup>5</sup>為解除史學家常見的疑慮，Rawski 教授也檢討了國民所得帳中缺乏家庭生產量、地下經濟活動，及隱藏性成本對長期趨勢分析的影響與補救之道。總的來說，作者認為從產出和支

<sup>3</sup> 該說法來自 1997 年 10 月 6 日 Thomas Rawski 教授給筆者之信件所述。

<sup>4</sup>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p. 4.

<sup>5</sup>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p. 15.

出面得到的國民所得帳，對於分析長期經濟趨勢相當有幫助，在實證研究中也稍可抵消前述三項不足之處所造成的資料缺失，並能有效呈現資料中的經濟循環及長期趨勢。

多倫多大學經濟系教授 Jon Cohen 則在第三章“*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Analysis*”中強調，了解經濟變動和歷史發展必須重視經濟組織分析。作者從經濟學的角度指出，由於市場對經濟資源分配的不效率(inefficiency)，人們才會用組織的方式更有效的重新配置資源，並使資源配置及流通的過程更加順暢。因此經濟組織的擴張代表了資源配置更合理，市場機制的缺憾得到修正的機會。<sup>6</sup>作者舉出家戶(household)、農場(farm)、和作坊(firm)代表所謂的經濟組織，並認為人類選擇那一種組織形式時，也同時是選擇了最有效的經濟資源配置形式。Cohen 教授運用經濟組織選擇代表資源有效配置的觀點，解釋為何南北戰爭後美國南方採取作物分成制(sharcropping)，而沒有出現契約性農業勞工(wage labor-contracts)的歷史現象；也以同樣的理由，解釋十七世紀法國農民為何偏好家庭式農場(small family farms)而非大型的農商業(larger agribusinesses)經營方式。<sup>7</sup>對 Cohen 而言，人類在組織上的選擇都有其經濟上的原因，所以他反覆地強調所有權在研究經濟行為上的重要性，也因此突顯了經濟學者 Ronald Coase 在組織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上的貢獻。

第四章“*Labor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是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作者 Susan Carter 與 Stephen Cullenberg 同為加州大學河堤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的經濟系助教授，他們透過歷史女神 Clio 和冥王 Hades 的對話，<sup>8</sup>表現出不同學科間相異的觀點，以及隱藏在這些差異背後的溝通基礎。這篇對話在相當程度上關照了勞動史學家所關心之性別不平等，勞資收入與付出不均等的社會道德性問題，但 Hades 所代表的經濟學者也不斷地指出，勞動市場的不平等既能以薪資或收入的型式表現，則經濟分析實在可以作為有效的分析工具，為歷史學家的分析提供更具說服力的解釋，而無需反

<sup>6</sup>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p. 60.

<sup>7</sup>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pp. 62-71.

<sup>8</sup> 據作者的說明，Hades 同時也是負責分配俗世財富的神祇。參見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p. 85, note.

覆訴之於道德淪喪或階級鬥爭等不夠明確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兩位作者雖都出身經濟學界，並不主張把經濟模型當作經濟史研究的必要手段，而是強調經濟模型是一項非常有用的工具，並非必須墨守的真理；就如同史學家常用的歷史分析法一般，這些分析工具的使用都必須以歷史脈絡為本，至少在研究經濟史的時候不該反客為主。

第五章“*The Economics of Choice: Neoclassical Supply and Demand*”由愛荷華大學經濟系暨歷史系教授 Donald McCloskey 執筆，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角度，討論經濟史上曾經出現的一些選擇行為。基於新古典理論的假設，McCloskey 以經濟資源稀少性為前提，強調人類在歷史中不斷的重覆“choice under constraint（被迫抉擇）”的模式，並舉例指出農民耕作模式的改變，並不全然受社會學或人類學因素所決定，<sup>9</sup>而是取決於農民在面對資源稀少時，有多少的條件足供選擇所致。<sup>10</sup>就 McCloskey 的論點來說，每一個個人(individual)都是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個體，一旦資源稀少的程度對其構成壓力時，這些個人就會發揮理性思考的能力，選擇符合其最大利益的經營模式。由於這種選擇模式可以應用到許多方面，McCloskey 特別強調經濟學應用的範圍，不該侷限在價格或成本等商業活動的領域中，事實上也應該適用於解釋許多文化形態的出現和社會結構的轉變上。作者更非常直接的要求歷史學家放棄定義不明的解釋語彙，如「成長(growth)」等詞，而從經濟選擇論的角度，使用詞意清楚之「利益(profitability)」或「不利益(unprofitability)」等名詞；<sup>11</sup>如此才能把「敘事性(narrative)」的歷史研究，提昇到「分析性(analysis)」的層面。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系暨歷史系教授 Richard Sutch 是第六章“*Macroeconomics: An Introduction for Historians*”的執筆者。和 McCloskey 類似，Sutch 也認為總體經濟學對歷史學家的幫助不止於經濟活動的範圍，而能夠全面地幫助研究者分辨何為「共相」、何為「殊相」，因而也避免了歷史解釋「以偏概全」或「以全論偏」的危險。舉例來說，以分區或分職業類

<sup>9</sup> 如風俗習慣或宗族組織等因素。

<sup>10</sup>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p. 123.

<sup>11</sup>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pp. 236-7.

別的方式，研究 1830 年代英國總體經濟中工資水準的變化，可以協助史學家判別 Lancashire 郡手紡紗工人所得下降的現象，是否屬於全國性波動的一部分，還是區域性或特定部門的現象。<sup>12</sup>大致上來說，Sutch 把總體經濟理論視為一種思考方式，而不是一套僵硬不變的數學模型，因此他在敘述中夾雜著大量的歷史例證，以表現總體經濟學的應用不僅適用於研究經濟活動，在不使用綜合性經濟資料(aggregate economic data)時，也能有效的提醒研究者避開某些解釋上潛在之謬誤。基於上述觀點，作者並不認為計量方法是處理經濟史唯一的手段，反而是從歷史現象中察覺經濟因素及其運作的能力，才是有志研究經濟史的學者應當潛心努力之處。

第七章“Money, Banking, and Inflation: An Introduction for Historians”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但往往令歷史學家裹足不前的經濟史領域。本章的作者 Hugh Rockoff 是 Rutgers 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也是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研究人員。作者以一個虛擬的經濟體為背景，用敘述的手法描寫貨幣如何以交易媒介的形式出現，到經濟體成熟後，貨幣功能多樣化的故事。Rockoff 的故事開始於中世紀的金本位貨幣和金礦開放所衍生之通貨膨脹，隨著貨幣功能的演變與貨幣控制機制的出現，作者以這個虛擬的經濟體為舞台，陸續說明了貨幣數量理論、Human 的貨幣流量機制理論、以及為何銀行業會出現於歷史中，並成為金融體系重要一環的過程。簡言之，Rockoff 把貨幣的出現和金融體系的形成，視為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隨著每個時期中，貨幣本質與金融體質的改變，而有不同的經濟機制及危機，貨幣理論和金融控制手段也隨之因應而生。一般討論貨幣理論或金融活動的文章，大多無法避免使用大量的數字及方程式，但 Rockoff 除兩度使用非常簡單的數學式子外，<sup>13</sup>全章都以明白易懂的筆法，交代貨幣與金融理論生成的背景和意義內涵。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學教授暨農業史中心主任 Peter Lindert 負責最後一章“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的寫作。Lindert 根據實際研

---

<sup>12</sup>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pp. 169-170.

<sup>13</sup>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pp. 180-181, 200-201.

究的經驗指出，經濟學者在分析政策與制度因素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時，往往不如他們針對經濟活動本身的分析來得真切；但歷史學家在前者上的表現明顯地優於經濟學者，因此雙方應善盡所長，並形成互補性的研究關係。<sup>14</sup>以國際經濟活動為例，Lindert 指出貿易障礙，如關稅壁壘與配額限制等，對於貿易本身和貿易對手國國內經濟都有影響。經濟學者雖能善用數量工具，分析國際貿易及國內經濟的扭曲程度，然在分析人為障礙形成之原因上，歷史學的訓練較能有所發揮。Lindert 並未因本書是為歷史學家所寫的原故，而避免使用大量的數學模型及方程式；再就全章寫作的布局來看，作者更儼然是把經濟學者與歷史學家視為經濟史知識「貿易」的雙方來處理。因此，本章所謂貿易創造價值(value)並使雙方互惠的觀點，<sup>15</sup>似乎也隱約提醒讀者，經濟學與歷史學間存在著互蒙其利的可能性。

作為一本寫給歷史學家的經濟學導讀，除了前述各章特別的編寫體例及內容外，本書尚有許多獨到之處。首先，本書建議了一份閱讀書單，方便讀者對特定的理論作進一步的閱讀。這份書單所收錄的論文都是一些經濟史研究的論述，按通論、統計方法、長期趨勢、經濟制度與社會結構、勞動經濟學、經濟選擇、總體經濟學暨貨幣理論，和國際經濟學等類別，分門別類予以整理。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論述都是應用經濟理論的實證研究成果，基本上比較不會造成理論不符實際情況的現象；同時從既有的研究成果裡，讀者也比較容易根據資料的相似程度和研究主題的特色，來決定參考那些研究成果，進而考慮如何應用特定的理論或概念於自己的研究中。雖說書單中建議閱讀的文章與中國有關者甚少，不過有興趣的研究者仍然可以從資料的比對入手，進而揣摩某些解釋模式在中國經濟史研究裡適用的程度，而逐漸探索出一套融合中國歷史特質與經濟學詮釋的方法。

本書另一個貢獻則是在書末，從經濟學者的角度向讀者提出一些如何閱讀或理解經濟學的建議。誠如這份建議的前言所述，經濟學之所以使用數量方法與模型，恰如歷史研究者必須學習多種語言一般，不過是一種經濟學者

---

<sup>14</sup>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p. 237.

<sup>15</sup>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pp. 209-212.

習用的「語言」或表達方式而已；歷史學家實在無須被這些外在的表達方式所限制，應該把經濟學視為一種思考方式，直探這種思考模式在研究上之助益或侷限性。<sup>16</sup>作者揣測歷史學家在面對經濟學理論時可能的反應，提出數點建議，協助讀者掌握經濟學的思考脈絡，而不被其表達方式所限制住。大體來說，雖不是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會因為這幾項建議，而使他們對經濟學完全釋疑，然而這些建議的確有助歷史學家分辨何者是經濟學中的分析技巧，何者才是經濟學的思考焦點，而且也告知讀者如何以經濟學者能夠理解的方式向他們求助。簡單來說，作者真正的目的在於指出：經濟學與歷史學在研究上互有長短，與其雙方各自閉門造車，還不如相互學習了解對方的優劣為何。畢竟方法與觀點上的歧異都不應該成為歷史研究的障礙，就算雙方無法完全解決對方的困惑，至少維持一個順暢的學術對話關係，也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不論是寫作動機、編寫方式、或各章內容，這本著作都值得細心閱讀，甚至是一本足供研究參考的著作。但是以 297 頁的份量，想要解決經濟學者與歷史學家間長期的分分合合，還是有許多尚待努力的地方。首先，本書能否引起多數歷史學家閱讀的興趣就頗有疑問。歷史研究者常見的表達方式，不外敘事（narrative，或 story-telling）與個案分析(case-analysis)兩種模式，而這兩種表達方式往往也反映了他們在閱讀上的偏好；就前者來說，本書除 Rockoff 的文章，可能還有一些「聽故事」的樂趣外，其餘諸篇相信對這類的讀者不免形同嚼蠟。Amy Thompson McCandless 對本書的批評也正是從此一角度提出的。<sup>17</sup>一般而言，歷史學家大多有一些考據癖，一篇結合學術史和理論介紹的文章，如能配合歷史學家的閱讀習慣和理解模式，或許更收事半功倍之效。當然，在經濟學家習於以數字表達觀點的今日，這樣的要求或許並不容易達到，但卻也並非毫不可能。其實自 Adam Smith 之《國富論》開始，經濟學者多半是以敘述法表達他們的觀點，數量模型成為主要的表達工具，還是本世紀中葉以來的事情。既然今日的經濟學者能將《國富論》的觀點以

<sup>16</sup>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pp. 245-251.

<sup>17</sup> Amy T. McCandles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book review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63:4, pp. 1131-2.

數量模型表達，應該也有可能把某些常見的理論模式，用文字轉述給讀者。這樣的批評，或許有苛責賢者的嫌疑，但在當前的經濟學界，確實有人將理論以文字表達於其研究之中，只可惜這類的學者人數不多；就筆者所知，其研究主題也多半集中於近代以前的歐洲經濟史。簡言之，如果把經濟學理論發展的歷史背景與過程參雜於文章的寫作中，應該比較能順應歷史學家的閱讀偏好；雖說這樣的寫法難度頗高，但在經濟學界有例可循，作者又希望擴大本書對歷史研究者的影響力下，筆者的論點與其說是一種批評，毋寧說是對作者群抱持更大的信心與期望。

由於本書各章出自不同的執筆人，在體例與寫作風格上並不統一，當然不免也造成了各章討論主題間無法相互補充的現象。歷史學家並不常根據經濟學中的各個主題來選擇研究題目，因此在研究的過程中不免將許多不同的主題置於一個更大的標題之下；一旦歷史學者在研究時想要參考本書尋求經濟學的解釋時，現有的編輯方式似乎會造成參考上的不方便。舉例而言，以 1930 年代上海鐵路工人生活水準(standard of living)為研究主題的歷史學家，就很可能需要探索鐵路事業的組織、工資水準的變動、上海地區物價變動等課題，所涉及到經濟學的層面至少就包括了組織經濟學、勞動經濟學，與貨幣金融等方面，大致上分屬本書之第三、四、及七章的內容。在理論訓練不夠熟稔的情況下，實在很難要求歷史研究者從這三章筆法迥異的經濟學導讀裡，毫不扭曲原意的摘選所需的理論模型，並將之融會貫通完成預設的研究主題。易言之，本書的內容已跨出了經濟學與歷史學對話的第一步，但要使這個對話過程順暢而且頻繁，經濟學者何妨在表達的手法上再遷就歷史學家一點；也在理論的應用方面，再給歷史學家一些便利。

最後兩點的問題則出自本書的內容。Dintenfass 曾經批評本書未曾仔細說明計量方法，如 T 統計量、迴歸分析、及相關係數等對於分析經濟史的意義與助益；<sup>18</sup>但 Rawski 以歷史同好們未曾對此不足處提議增修為由，認為這

<sup>18</sup> Michael Dintenfass, Book reviews, “EH.TEACH POSTING” of EH.NET and H-Net, 30-Sep-1996. 這是一份以電子郵件形式流通的學術期刊，如需進一步的資料請連線至：IN%“eh.teach@cs.muohio.edu” 或 IN%“H-Net@H-Net.Msu.Edu”。

一點缺失應無損於該書的貢獻。<sup>19</sup>或許統計方法不是本書介紹的重點，但這些統計技巧既屢屢出現於經濟研究中，作者們何妨對統計量與模型間的關係再多作著墨。畢竟統計專書只能告訴讀者如何求取統計量，至於何時使用適當的統計技巧，或如何詮釋特定統計值在經濟活動上的意義，歷史學家終究還需經濟學者的協助。前述各種的統計方法雖不如數量模型來得複雜，但從邏輯分析的角度而言，二者實無二致。如果歷史學家能接納統計方法作為分析工具，則較能接受其背後的數理性思考邏輯，也更有可能理解經濟學者的思考脈絡與論述依據。唯有使經濟學者信任歷史學家的直覺判斷，使歷史學家接納經濟學者信賴的數理邏輯，才能拉近雙方的認知。本書沒有專章論及此一主題並無損於其價值，但若能增加這類說明應可再收畫龍點睛的效果。

另外一個問題則涉及到經濟學本身的差異性。以本書中介紹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各篇來看，文中對於人類理性(*man is a rational being*)的假設，以及引伸出的利益極大化觀點(*maximizing benefit*)均未加質疑的引用，亦未提及當前經濟學界所作的一些修正。且不說歷史學界對人類是否為理性的動物尚有疑問，經濟學界內部其實也對應否完全接受這種假設眾說紛紜。<sup>20</sup>再者，當前經濟學界對經濟組織改變是否就代表資源分配效率化、經濟選擇是否一定符合最適化原則(*optimizing principle*)等，也還有許多不同的意見。<sup>21</sup>本書的作者們應當在文章中告訴讀者，這些假設的侷限性為何，為什麼當今經濟學界會產生懷疑，以及當前經濟學修正的方向等；如此在引導讀者進入經濟學的思考脈絡時，同時也能向讀者呈現經濟學的多樣性和多元化。對於長期以來歷史學家指責經濟學者習於「套模型」的成見，或許能在更多元化的討論中，顯示經濟學的模型其實是非常有彈性的，而且也不斷根據事實情況作理論上的修正。

總的說來，這本論文集的出版開啓了經濟學與歷史學對話的基礎，對有

19 同上註。

20 Shaun H. Heap, "Rationality", in Heap, et. als., eds., *The Theory of Choi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pp. 3-25.

21 Amartya K. Sen,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 (San Francisco: Holden-Day Inc., 1970), pp. 5-6.

興趣利用經濟理論的歷史學家而言，這本書所能提供的協助遠超過個別的經濟史論著或一般的經濟學教科書。然而，這本論文集只是把雙方的對話關係拉近到某種程度而已，想要真正的促進溝通的順暢與頻繁，還有待雙方共同努力。前述粗淺的一些批評完全無意否定作者們的善意及努力，只是從求全的角度，希望作者們能更加滿足歷史學家求知的欲望，也忝為讀者們點明：本書是一本有創見、有價值的經濟史研究參考著作，但不應該視為現有經濟學理論之集大成者，也不應該毫不加以思索地就把其中介紹的假設、模型、或方法直接運用於歷史研究中；畢竟歷史學家的主要工作在於利用各種分析工具闡明歷史經驗，而不是用歷史現象來證明經濟理論的價值。此外，雖然本書作者們對於經濟學與歷史學的合作，基本上抱持著非常樂觀的態度，認為只要歷史學家能夠了解經濟學者的思考邏輯與分析工具，則雙方應該可以在經濟史的領域裡合作無間。不過，最近仍有學者發現歷史學家與經濟學者對研究經濟史，其實有非常不同的關懷點，因而造成雙方研究態度上的差距。<sup>22</sup>關懷角度的不同，或許是造成這兩種學科整合困難的原因之一，但不應該是迴避對話的理由。因此，對於和經濟學者有共同關懷的歷史學家而言，本書可以做為兩方整合的踏腳石；對關懷點不同的歷史學家來說，本書仍可視為學術對話的橋樑。簡言之，這本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或許還存在著一些小問題，但畢竟是正面回應兩種學科對話關係的需求，而歷史學家們應該也能由其中找到一些靈感和助益。

劉士永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sup>22</sup> 根據葉淑貞的歸納指出，歷史學家比較關心分配是否公平、所得是否合理等難以客觀量化的問題，而經濟學者則多半注意到經濟效率這類能以數據客觀化的論題。詳細的討論參見葉淑貞，〈論臺灣經濟史研究的歷史解釋觀點〉，《經濟論文叢刊》，22: 4 (1994)，頁 477-503。